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书社

译注 倪其心

审阅 刘仁清

阮籍诗文选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77804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阮籍  
诗  
文  
选  
译

名著选译丛书

译注

倪其心

审阅

刘仁清

中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责任编辑：施 维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徐恒瑜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阮籍诗文选译**

倪其心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6.5

字数11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DI87/23



##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学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 前 言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魏、晋之际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齐名。他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在魏陈留王景元四年（263）去世。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丞相府僚属，擅长军书檄文和乐府歌辞，曹丕称他“书记翩翩”（《与吴质书》）。阮籍三岁亡父，由寡母抚育成人，事母至孝。他三十三岁才出仕。魏正始三年（242），太尉蒋济召他为幕僚，他上奏记婉辞。蒋济恼怒，他被迫赴职，不久托病辞归。又为尚书郎，亦病免。正始九年（248），曹爽执政，广揽名士，召阮籍为参军，他拒绝应召，归田屏居。一年后，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时人因而佩服阮籍大



有远见。司马懿擅权，召阮籍为从事中郎。他见司马懿排斥异己，杀害名士，残酷无情，因而就任以全身。司马昭擅政时，他仍为从事中郎，封关内侯，迁散骑常侍。其间，他曾出任东平（今属山东）相，求为步兵校尉，所以史称“阮步兵”。

阮籍生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年头，长于魏文帝、明帝朝三国鼎立的时代，主要活动于齐王曹芳正始以后的时期。曹魏集团腐败，司马氏集团取而代之。阮籍去世那年，蜀汉投降；后年，司马炎登基，晋朝正式建立。他的一生，大体处于三国鼎立阶段，恰与曹魏王朝兴亡同步。这四十多年，东汉虽亡，但天下分裂，尚未统一；三国割据称帝，但不知最终鹿死谁手，都未必长久；三国各自巩固内部，发展经济，国势相对稳定，但战争从未停止；三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明里妥协，暗里切齿，渐趋激烈。大体地说，较之汉末农民起义、军阀混战的动乱而言，这一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有了缓和。但封建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并未终止，由三国争夺天下，到三国上层统治集团争夺政权，变得集中而明确。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曹魏统一天下的条件愈益成熟，曹魏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斗争对立面主要就是曹魏新兴士族集团和司马氏代表的世家士族集团。因而这个历史时期的

基本特点是，三国鼎立，相对稳定；天下未定，实质动荡。正因为实质上这是个动荡未安的乱世，所以在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领域里，也是充满斗争，显得相当活跃。

陈留阮氏是曹魏新兴士族。阮籍早孤，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攻读儒家经典，“少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咏怀诗》其十五）；但也爱读《老子》、《庄子》，并且学习击刺武艺，能长啸，善弹琴，还喜欢喝酒。在曹魏集团兴盛的年代，青年阮籍志气宏放，性格开朗，但不受拘束，有点傲气，常常独来独往，因而引人瞩目，先觉得他“痴”，后来发现他“异”，不同寻常。其实他既想做才德高尚的贤者，“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同上引）；又要做个武艺高超的战士，“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同上其六十一）；更是胸怀济世的爱国壮志，“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壮，垂声谢后人，气节故有常”（其三十九），要为国征战，统一天下，做个忠义爱国的壮士。从《咏怀诗》里怀念往事的篇什，可以看到他对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和生活是深情系之的。

当阮籍怀抱壮志，走进社会，接触政治现实

后，他痛心地看到了曹魏集团骄奢浮华，趋于腐败。这使他深为失望，无意仕进，同时他也敏锐觉察司马氏集团伪善险恶，高唱礼法，阴谋篡权，使他激愤忧患，更不肯依附。他沉默，苦闷、愤慨，深感这个时代污浊混乱，他的才能无法施展，他的壮志不能实现。有一次，他游历当年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决战的广武古垒，感慨地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本传）“竖子”是范增在鸿门宴上斥骂项羽不材的称呼。阮籍觉得自己的时代就象楚、汉对峙当年似的，正因为没有真正的英雄，所以不材可以成名而称英雄，那些成功的人物也非必是真英雄。他又曾“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同上）。这近乎痴狂的行为，是他曾努力追求理想而终于失败的情绪发泄，也是对这黑暗混乱时代的软弱抗议。他清醒了，也转变了，所以青年阮籍虽然已有“异”名，也有人荐誉，但他却不肯做官，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并且更加好酒，还几次托病辞官，显得少年老成，城府不浅。事实上，那位热情开朗的爱国青年阮籍，只留于乡间，透露于回忆，闪烁于放诞言行，并未径直冲进社会，奋斗仕途。出现于历史舞台的阮籍，是个看来充满矛盾的文人、学者、士大夫。

在政治上，阮籍是矛盾的。他心里愿望曹魏王朝振兴，但却因无望而不肯出仕；他心里反对司马氏集团篡魏，但却因高压恐怖而低头就范。他和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以及堂侄阮咸等七人，都属曹魏新兴士族。由于不满曹魏腐败，更反对司马氏篡魏，他们经常聚游于竹林，崇尚老、庄，酣饮谈论，行为放任，不求仕进，当时以为清德，称之“竹林七贤”。但当司马懿大权独揽，施行高压，他们之中除嵇康、刘伶外，阮籍、山涛等五人都被迫出仕。阮籍做司马懿从事中郎，已届四十不惑之年，明知不可而为之，却也从此不致仕，并且凡司马氏府上宴集，他有情必赴，到必痛快吃喝。实际上，他做的是清贵之官，并不出力，只是以仕为隐，隐于朝廷，借以全身，既不为仕，更不为功名富贵。这种主仕隐夹缝里求生存的官，很难做，更痛苦。所以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同上其三十四）。这种日子极不好过。

有两个人很理解阮籍这种处境和心情。一个是嵇康，一个是司马昭。嵇康认为阮籍是位贤者，“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只是

喝酒过分。他说，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十分理解，阮籍是司马氏党羽即那些礼法之士的伪君子们的死对头；正是为了避免伪君子们阴险加害，只得托庇于大将军司马昭。司马昭称阮籍“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因而“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司马昭很了解阮籍的软弱，既要利用他的名望和文才，便乐得保护，显得器重，博得爱才和宽容的美誉，有利自己篡魏。对此，阮籍心里明白。司马懿曾想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昏醉六十天，借醉表明态度，拖了过去，司马懿也不再强求。司马昭要进爵晋王，加九锡之礼，表面却一再推辞，百官一再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章。阮籍也借醉拖延。等到使者来索取表章，把他叫醒，他才写了一篇文辞清丽的空话，敷衍了事。而司马昭也并不加罪。阮籍守母丧时期，司马昭请他赴宴。宴席上，礼法名流何曾斥骂阮籍服丧期间大吃大喝，有意破坏司马昭以孝治天下的法制，要司马昭予以惩处。阮籍照样吃喝，不予理睬，反而是司马昭替他解围，说他守孝哀伤，身体很弱，应该补养。大概由于礼法之士纠缠不休，他便请求到东平做官。

这是个穷僻小地方。他骑驴赴任，到任就把衙门的围墙拆掉，使“内外相望”，颁布了几条简单明了的法令，十天就返京。他写了篇《东平赋》说，“岂淹留以为感兮，将易貌乎殊方；乃择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乐康”，表明本意只求清闲几天，并不真想做官。他又听说步兵营的厨师善酿酒，而且贮藏了三百斛好酒，就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可见他确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采用仕而隐的对策，旨在远害全身。当然喝酒过多，有害健康，难怪嵇康要批评他。

在思想上，阮籍是矛盾的。他在青少年时培育的道德情操和爱国壮志是从儒家思想来的；而且真心追求，始终未曾忘怀。成年阮籍变成了老、庄道家思想的信徒，却是并不彻底，有所折衷的。现实政治的混乱黑暗，使他不能兼济天下，只得明哲保身，独善其身，走了以仕为隐的道路。

本来，自正始以来，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些正始名士，原是曹魏新兴士族上层的一些青年文士，他们才思敏捷，行为放荡，爱好老、庄，喜欢清谈，调和玄、儒，探讨道德，掀起一股谈玄风。何晏依附曹爽，当了侍中尚书，玄风也随之而盛。阮籍本来对他们不满：“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同上其十一），就是说他们象楚国宋玉那

样，有才而不正经。但当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何晏也被杀，株连一批正始名士。王弼在正始十年也病逝了。在这种高压恐怖气氛下，“竹林七贤”反而接着何、王的玄谈，也大谈老、庄，探讨道德，而且行为放任，不求仕进。显然，实质上这是一种抵制司马懿的政治行为，其倾向与阮籍以仕为隐是一致的。因而成年阮籍虽然以老、庄思想信徒活跃于历史舞台，但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特点和倾向：以老、庄的自然之道，求孔、孟的仁义之德，而以锐利的锋芒指向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讽刺其虚伪丑恶，揭露其罪恶根源。这就使他的思想言论，有时俨然老、庄忠实信徒，有时却象孔、孟后学，显得互相矛盾。

阮籍对儒家思想很理解，从未根本否定。但他常用道家自然天理的观念来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对儒家宗奉的三代圣君盛世与历代亡国乱世进行分析批判。例如他的《乐论》是阐述孔子所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理论的。文中首先指出，依照“自然之道”，最完美的音乐和最完善的移化，是“乐之所始”，即原始时代的朴素的音乐，其特点是“不烦”和“无味”。然后指出不同风俗的产生，败坏了原始朴素音乐，其原因是：圣人不作，道德荒坏，政法不立，智慧扰物，化废欲行。”可

见其原则和出发点是道家思想。但在论述风俗产生之后的音乐教育作用时，则几乎完全采取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认为“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同样，他阐述《易经》的《通〈易〉论》，也是用自然之道来解释《易经》思想，肯定《易》是“昔之玄真，往古之变经”；认为《易》之为书也，是依照“顺自然，惠生类”的根本道德原则来论述客观事物变化规律的。但是在具体论述《易》的来历及具体内容时，却又基本采取传为周公所著《系辞》的观点。其结论则折衷玄、儒：“是以明乎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圣人独立无闷，大群不益，释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观之，《易》以通矣。”这就是说，要通《易》，必须明瞭一个根本道理，明天道而审人德，按照自然天理来考察人的本分需要。自然有天地万物之分，人类有上下贵贱不等，各安本分，天下太平。而最理解、掌握这一根本道理的圣人，就能彻底超脱，听任天地万物及人类自然发展。



显然，《乐论》、《通〈易〉论》的思想实质都是以自然之道、无为之治为最高理想和根本法则，来达到维持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理想是道家的，现实则属于儒家，阮籍的本意在于调和折衷。但这种调和折衷只能自圆其说，事实上是矛盾的。

阮籍阐述老、庄思想，主要是用来分析、批判、揭露魏、晋之际的现实政治及各类儒者的面目。其《通〈老〉论》已佚，但有一条佚文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可以看到，阮籍以老子自然之道为根本法则和最高理想，所以将传说三皇五帝的远古时代到春秋战国，依次简括为“道”、“德”、“仁”、“义”、“智”的五种政治、道德观念，认为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薄。

《达〈庄〉论》直截针对“缙绅好事之徒”对《庄子》的非难，所以在全面阐述庄子思想的同时，借历史事例予以尖锐激烈的指斥。例如在比较《六经》与《庄子》的区别时，认为《六经》是